

新型城镇化下的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XINXING CHENGZHENHUA XIA DE ZHONGGUO
QUYU JINGJI XIETIAO FAZHAN

葛宝琴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新型城镇化下的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XINXING CHENGZHENHUA XIA DE ZHONGGUO
QUYU JINGJI XIETIAO FAZHAN

葛宝琴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城镇化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葛宝琴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78-0026-2

I. ①新… II. ①葛…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715 号

新型城镇化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葛宝琴 著

责任编辑 谭娟娟 尤锡麟

封面设计 包建辉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 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7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0026-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8

前言

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也是近十几年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总量、结构的协调和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状况，学术界专门提出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解决区域经济差距的问题。可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定义和判断标准，甚至对需不需要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也一直没有形成共识。结合中国的实际，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赶超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集聚和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已经在理论界得到广泛证实。城市是集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于城市集聚会产生溢出效应，而溢出效应提升了创新能力，推动并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城镇化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国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也仅是从单方面来研究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远远不足以解释目前的现实问题。中央多次提出加快城镇化发展，把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把培育形成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与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带结合起来，以推进城镇化带动区域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以增强综合承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新型城镇化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改变传统城镇化建设中片面追求城市数量增加和空间规模扩大的理念，更加强调大、中、小城市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本质和要求。本书以系统观为指导，研究开放状态下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长江三角洲实现不连续点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找到规律，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区域协调发展



展的必然性,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集聚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多目标、多视角地探索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集聚产生的经济差距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城市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通过资本溢出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干中学”效应可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

如果两地区距离遥远或者相对封闭时,资本溢出效应很小甚至为零,这时候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有关,城镇化水平高的地方收入也高。当处于经济一体化状态下,资本自由流动并且完全溢出,这时两地区无收入差距。如果前提条件是两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不相同,便可以通过调节溢出程度来降低收入差距,以使收入差距能在某一位置达到均衡。该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分阶段性的。在区域发展的均质化初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提高贸易自由度,加快要素流动,使集聚力量占主导,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让城镇化水平在提高的同时也使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扩大;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力和扩散力同时在增加,扩散力的增长速度会超过集聚力,这时候规模报酬递减开始在集聚地发挥作用,城市集聚地的生产要素开始向周围扩散和传递,此时城乡差距开始缩小,使区域内部向更高水平的均质化方向发展。结合中国的国情,可以通过一体化的空间调整机制协调区域内部的差距,例如,通过城市群的组团发展来增加彼此的溢出效应。就东西部而言,一方面加快西部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高城市集聚功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增强自身的“干中学”效应和对外来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互动,通过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促进溢出效应向远距离的落后地区传播。

第二,从理论上论证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关联。一般情况下,集聚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发达地区福利水平的提高,而落后地区福利水平的降低。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引入了内生增长,那么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空间集中所产生的创新率的提高同样使欠发达地区受益。像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就比较高,东部的增长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很难弥补对西部造成的损失。之所以选择协调是因为永久的区际收入差异只能缩小无法消除。集聚—扩散机制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集聚主要引起局部地区的快速增长,扩散则将促成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跨区域转移或者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区际产业转移强化了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的外部联系,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无论对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来说都是“双赢”。新型城镇化下的地区经济发展要转变增长方式就必须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增强创新驱动动力,并依靠科技进步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在空间布局上,强调城市集群化发展而不是单中心城市的带动,通过城市群内部网络化、组织化的空间联系加速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溢出效应,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政府机制作为市场调节的必要补充,保证了所有机制的顺畅运行,加速协调发展的进程。

第三,进一步探讨城市群内部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模式。城市群是区域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其本质是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表现。城市群一体化是在通信一体化、空间一体化、政策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微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中观的产业发展和区域分工、宏观的政府协调和推动以及科技进步和环境改善等。本书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是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府、FDI(对外直接投资)、科教、环境、物流是影响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外,空间相关性分析也证实了相邻城市之间确实存在互相影响和集聚发展的趋势。

本书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理论研究方面,通过对新空间经济学、产业集聚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等的梳理和综合,建立模型说明城市集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从而为以城镇化为主线,通过集聚—扩散、资本溢出、城市体系演化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在本书的模型中,引入了全局溢出、局部溢出和完全封闭三种状态并分别对它们进行讨论,还加入了城市拥挤效应使结论更加符合实际。二是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尝试引入空间因素,将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等最先进的分析工具运用于实证检验,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助于快速形成增长极,产生联动效应影响外围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及空间结构的改变,使地区的城市规模体系发生变动。整个区域城镇化水平提高成为广域的集聚中心和增长极,凭借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建立可以增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提高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微观机制和宏观政策相结合,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线,将产业和空间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落后地区既可以通过城镇化发展加快本地区的产业升级,也可以吸收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形成本地



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根据新型城镇化的理念提出差别化的发展定位,在经济发达地区注重中小城市及重要乡镇的发展建设。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人口的严重膨胀和产业过度集中而导致的交通拥挤、空气和水污染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大中城市的辐射范围,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本书将城市、城市群的扩张与增长极理论和现实应用结合起来,并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为例来说明城市群内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动力机制和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的背景	1
1.2	研究的意义	5
1.3	相关概念的辨析	8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14
2	相关理论基础	17
2.1	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	17
2.2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
2.3	集聚和增长理论	23
2.4	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理论	35
2.5	区域城镇化发展理论	41
2.6	小结	45
3	经济差距、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增长	47
3.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47
3.2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及原因	57
3.3	统筹城乡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62
3.4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70
3.5	小结	76
4	理论分析框架:城市集聚、增长和经济差距	78
4.1	模型的假设	78
4.2	模型构造	79
4.3	数据模拟的结果	95



4.4	城镇化、集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01
4.5	小结	107
5	城镇化与集聚—扩散机制的互动研究	108
5.1	城镇化与集聚—扩散机制的理论研究	108
5.2	城市体系的内生增长模型	117
5.3	城市集聚效应的产生	128
5.4	关于长三角集聚—扩散机制的实证研究	130
5.5	小结	139
6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 and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40
6.1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	140
6.2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144
6.3	浙江省城镇化与产业发展	151
6.4	区域间的产业互动与经济协调发展	165
6.5	小结	179
7	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80
7.1	以城市为载体的区域增长极	180
7.2	城市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0
7.3	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动力及空间结构演化	202
7.4	小结	214
8	结论、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	215
8.1	主要结论	215
8.2	研究展望	219
8.3	政策建议	220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7

1 绪 论

1.1 研究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国家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很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关注其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调整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整体薄弱,沿海和内地发展极不平衡,“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确立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把经济重心从东部沿海地区内倾到中西部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内地的工业基础得到加强,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使当时工业部门不全、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变。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三五”计划提出了三线建设的要求,在集中向三线地区投资的同时,将一部分工业比较密集的工厂和研究机构搬迁至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但由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存在根本上的缺陷。70 年代,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对外关系的改善,中央对沿海省份的投资加大,对三线建设的投资力度减缓,新项目主要放在东部和中部的京津唐、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山东半岛、辽宁中部、江汉平原等地区。“五五”计划时期是改革开放的酝酿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由内地向沿海转移。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转向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首先提出沿海优先发展战略。随着东部沿海的发展,国内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进入 90 年代,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国家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政府的执政思路是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



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①。党的“十八大”报告^②将“三农”的发展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区域政策为基础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经过了四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施了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使广东经济在1980—1990年迅速崛起;第二次是1990年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使长三角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促进了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第三次是于1999年底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通过财政支持来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开发;第四次是2003年以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的区域发展政策。事实上,因为中国面积大,情况复杂,国家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对所有地区的发展起普遍的指导作用。欧盟和美国区域战略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其规范、科学的区域规划制度。而目前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三大块区划基础上,必须加快构建新的经济区划体系,合理定位各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促进区际和区域内部的合作;加速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区域要素和资源整合,培育各区域经济核心增长点,推动区域要素的快速集聚,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是促进区域融合和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当今社会正处于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如何融合、如何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马科斯·陶伯(2005)指出,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为了享受区域内贸易的好处,区域内部国家要让出部分主权来给这个区域。例如,在欧盟内部,一方面各个成员国失去了不少原有的国家权

① 温家宝在2003年3月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24字原则。

②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利,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不少国家之上的权利^①。在资本流动方面,应作出更多制度方面的创新,通过各种交流使得制度融合并且更易于接受。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一轮区域经济整合从而实现区域共同进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许多现实因素阻碍了区域融合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步伐。

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国际间最典型的产业转移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东亚,由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劳动力供给状况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东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最先接受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又启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这种产业转移现象,一些经济学者称之为“雁形模式”。国外产业转移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在美国早期开发阶段,当时制造业工厂通常设在靠近原料来源的地方,后来由于运输条件的变化,工厂更倾向于设在靠近产品市场的地方,这促进了美国工业由东部转移到西部,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过一次较大的产业转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沿海地区许多战略产业,特别是和国防工业有关的机械、电机、化工等重化工业部门的大批工厂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被称为“三线地区”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目的是为了实现当时中央最高决策层所决定的“备战”和“要准备打仗”的国家战略。1955 年在国务院“东锭西移”的政策指导下,上海的纺织产业也将大量的棉纱生产能力(有 50 万锭)转移到新疆地区,这些产业转移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行为,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主导下的产业转移完全不同。(陈建军,2002)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产业跨区域发展会对产业所在地域以及转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会成为区域经济协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城市是集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集聚经济会产生规模收益从而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所以城镇化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则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城镇化过程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关,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是城市产生和成长的前提,产业分工、专业化和社会化形成了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体系。集聚经济的规模决定城市的规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于城市集聚产生的溢出效应,而

① 2005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差距、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溢出效应提升了创新能力。中国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仅从单方面研究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伴随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是导致不同地区增长快慢的根源。刘传江(1999)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化、工业化和服务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居化、规模化和城市化。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之间高度耦合,产业集聚的规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扩散效应和产业转移又会导致城市体系结构的相应改变。城镇化发展是联系集聚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有效途径。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简称《城市蓝皮书》)指出,我国已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城市蓝皮书》还显示,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如果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

城市群或者都市带的形成是城镇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消除各城市之间的壁垒,加快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社会要素的配置,提高工业化效率,还可以通过各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例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整体GDP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整体GDP的份额为70%,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的GDP占全国整体GDP份额的38%(陈修颖和于涛方,200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首届“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指出,应大力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已经形成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应该作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手段来推动和发展。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明确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进重庆、成都、西安的区域战略合作,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振兴东北地区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

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的发展。中部地区崛起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的发展。东部地区率先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

1.2 研究的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集聚和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在理论界得到广泛证实。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和 Ottaviano,1999,2001)将罗默(Romer,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与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和 Venables,1995)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结合起来,以集聚和经济增长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构造出集聚与增长自我增强模型来探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内生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地理模型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它们解决的问题是相关的: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目标是分析新的经济活动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出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这些经济活动是如何选择区位以及它们为什么在空间上集中。新的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区位选择应该是一个相关联的过程。从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理论的假设都是反映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型产业结构。由于贸易成本和递增规模报酬的相互作用,工业部门将会向拥有较多最终需求和创新的地区,也就是增长更快的地区集聚,因而经济集聚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同时,经济集聚会降低那些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创新成本,因而也会促进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需不需要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共识。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 和 Thisse,2002)的研究强烈支持集聚和增长互相促进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政策导向的扩散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因为甚至居住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地区的人们也会比在分散状态下更加富裕。集聚、增长和公平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的,只有狭隘理解公平的时候才会存在冲突,如平均主义。而事实上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要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必须建立一个包含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门学科,涉及非均衡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转移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体系演



化理论等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胡佛(Hoover, 1937)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单个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二是某个区位上单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也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即该产业在那个区位总产出规模的扩大;三是单个区位上所有产业的所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也称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指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产业在该区位总经济规模(人口、收入、产出或财富)的扩大。其中,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统称为集聚经济。一般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常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的产生和规模。尽管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能够说明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但地方化经济对于解释城市群的形成存在局限性。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地方化经济或是城市化经济,主要考察了单一城市内经济行为主体所获得的外部性,基本上没有考虑与外部城市之间的交易,特别是地理空间上与之邻近城市的交易。此外,它们强调的都是企业总体数量增加(规模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忽略了企业之间因产业选择的异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集聚经济的本质是分工经济,杨格(Young, 1928)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从斯密定理出发认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厂商或产业部门的规模所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总之,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解释城市群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包括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等。

有关区域经济圈的研究,特别是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经济地理学界关心的热点话题。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区域经济圈的意义和绩效,以及相关的空间结构和规划治理上面,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圈的内在动力结构和自组织形成机制以及区域一体化在实现区域间或者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功能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笔者在对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内在原因,寻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模式,整合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等理论,从强化区域竞争力的角度,探讨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将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双重调整结合起来实现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将城市集聚、城市功能演化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探索城市等级规模的发展模式和一体化的演变趋势。

1.2.2 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主要面临两大课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二是区域经济关系问题。显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涵盖了上述两个问题,它不仅要回答区域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还要回答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关系协调的

问题。首先,区域协调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陈栋生,2005)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制约了我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限制了我国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如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潜力得不到释放,也势必导致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同样,东部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区域内部如何协调的问题,所以,既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又要促进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协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次,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在全国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中西部集中了我国大部分自然资源,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工业集中,教育科技比较先进,地理上又具有对外开放的优势。目前,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压力,迫切需要“腾笼换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中西部经过多年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好转,正处于大规模开发的初级阶段。在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下,东部的优势会逐步向中西部扩散,与中西部的优势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带和经济增长点。(孙祖芳,2000)再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做法,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同样如此,区域要发展必须要在内部拉开差距,使个别条件好的地方先富起来再来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但在提高整体效率的同时,又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止收入分配逐步趋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无法维持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是目前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现有解决思路大多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而事实上,单靠政府盲目自上而下的有限投入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因此,必须将政府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找出新的发展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理论能单独解决目前国内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选择产业集聚作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是有现实意义的。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产业集聚主要存在如下作用:第一,产业集聚创造区域的竞争优势;第二,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创新;第三,产业集聚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孙久文,2007)除此之外,通过研究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能够解释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已经对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和机理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城市是多样化产业的集聚,研究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为通过城市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转移理论的引入可提供一个实现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新视角。不同地区产业分工的存在预示着地区



经济发展的阶层性,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引起其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联动反应,就是以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作为载体,实现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和拉动作用。相邻城市之间的分工和互补的关系会在地区间呈网络状蔓延和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从产业角度很难描述其空间分布和演化,城市群的引入将有助于建立产业发展的空间维度。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制的研究看,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不同时期影响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城市群演化的主要动力是集聚和扩散作用,这正好和产业集聚理论中集聚、扩散的作用力联系起来;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交换,是城市群形成具有不同规模和层次结构有机体的重要保障,因此,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发展正好可以和区域分工以及产业转移联系起来;同时,城市群演化按照“点—轴—面”的路径,可以将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逐步放大,从而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以往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方面,很少涉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缺乏企业微观层面和产业中观层面上的解释,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至于东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到底在哪里,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能否复制到中西部地区,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在城市群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从系统论角度出发,阐明城镇化促进落后地区的集聚增长作用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相关概念的辨析

1.3.1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①,也是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规划纲要、“十五”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国家“九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

^①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